

骊山“捉蒋亭”易名“兵諫亭”始末

□ 刘荣庆

职比芝麻小,胆须比天大;若还天塌下,站在山顶撑着它。头上司不落毫,小可胸口如猫抓。亭易名字非小事,一字不慎坐洋蜡。推拖、承揽均有责,麻杆打狼两害怕。幸亏征集党史料,且称“兵諫”副年华。倘若顶峰来问话,当年报纸代咱答。西安事变供考证,斟酌统台而后覆。

此打油小诗写于1976年10月26日,即“双十二”四十周年纪念日之前。“文革”结束后,因“捉蒋亭”一名直白拙朴,不合时宜,影响台胞、海外华侨与外国游客的观感,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建议易名,并建议撰写一则新的景点简介(当时尚没有旅游局这个行政建制)。据了解,骊山半腰西安事变建的中西合璧纪念亭,当初在虎斑石下修了座土木结构的亭子,起名“民族复兴亭”。1946年3月,蒋介石麾下嫡系,被誉为“西北王”的胡宗南,邀黄埔军校七分校将官慕捐,拆掉旧物,建筑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亭子(高4米、宽2.5米),起名“正气亭”,又称“避难亭”“蒙难亭”等。亭之上下左右石壁,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纪念性石刻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铲掉了山石题刻,易名“捉蒋亭”(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司令员所题写)。改变“捉蒋亭”名称,我完全赞成。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潼县虎斑石下兵諫亭与华清宫内的五间厅两处西安事变遗址都列入了,一个是当时东北军搜山中发现和捉蒋介石的现场,一个是事变枪响前蒋介石及其卫队住的行轅。1982年,我在临潼县创办骊山学会,请武伯伦先生出任会长。说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先生告诉我:“兵諫亭这个命名好,符合历史实际,不褒不贬,能长期存在。这个地方原有的石刻本应当作为历史遗存保留下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宽阔的胸怀。我有过建议,可没有人听嘛,全铲了。挺可惜的!”(见陈元方史础宏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29页,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第1版。)

究其实,兵諫亭这个命名,倒与我直接相关。1976年10月,骊山虎斑岩“捉蒋亭”改叫什么新名称呢?县外事与文化文物人员提出预定方案,经请示省地外事部门,均称这是临潼县行政权限自定的具体事务;可时任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等均推托给县委宣传部决定。笔者刚走马上任到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首要任务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1976年公开出版的西安事变图书资料极少,学术研究空气淡薄。接到“捉蒋亭”易名的挠头事,推托吧失责,承揽吧担责,麻杆



兵諫亭

打狼两害怕。于是,翻阅史料。西安事变当天,东北军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系的6封电报(张学良一封、王以哲二封、刘鼎三封)用了“寻获”“扣留”“被捉”等词语,只有在陕北毛泽东主席身旁当机要科长的叶子龙看到一封电报中称西安事变为“兵諫”,但不明确切含义,而《叶子龙回忆录》到2000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称,张杨内部认定西安事变为“兵諫”,但这部著作2008年12月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米哲沉的《杨虎城传》公开出版较早,也是1979年8月的事了。1976年11月—12月12日,我在临潼县委很难找到西安事变的第一手可采信的资料。“文革”后期,我私下在临潼地下党人中征集党史资料时,也没有人用过“兵諫”的术语。但他们告诉过我,杨虎城事变发生后的演讲登在当时报上,这启发拓展了我的思维方向。经多方查考,我找到了杨虎城1936年12月15日对全国的广播讲话文本,里面说:“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主任委员就很恳切的谏诤过多次……”1936年12月16日,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说:

“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谏诤了。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

找到杨虎城将军公开演讲两条历史根据,我便由此进行逻辑分析:

其一,杨虎城说的“劝谏”,不在“这次谏诤”之内,那么,“这次谏诤”就是用军事手段“捉”起来,逼迫蒋领导抗日;

其二,“谏诤”这个中国历史概念,一般指封建朝廷臣子对君主、皇帝忠言逆耳的进谏(纳言之政),促进统治者明智决策。通过文书(谏书)或口头规劝(谏言)等沟通渠道均无效,而无奈用武力逼迫之称为兵諫,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鬻拳对楚文王实行兵諫:“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听;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安史之乱,唐玄宗逃蜀半途发生的陈玄礼兴平马嵬哗变,卫戍部队逼迫唐玄宗下诏杀死杨贵妃、杨国忠、虢国夫人,太子李亨乘机脱离父皇控制于灵武登基称帝,经部队哗变而形成政变。(参见拙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205—206页《〈长恨歌〉遗韵》)。可见,中国史书上将用武力胁迫进谏称为兵諫。

其三,杨虎城读书虽少,但所用智囊、秘书都饱读史书。

由此,我认为“兵諫亭”比较雅致,也符合实录史例。于是,我指定临潼县文化馆李凌用魏碑书体重写亭名,取代“捉蒋亭”。同时,我照“兵諫”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径,写了名胜景点介绍词,也由李凌在木匾上书写悬挂。

为防万一上峰追查责任,我让拍照存档。笔者当时作的这首打油诗,带了自嘲兼为可能出现的责任风险预留了文字依据,有政治上以退为进的寓意。如今有人公开著文说,1986年临潼才将“捉蒋亭重新改为兵諫亭”。就我亲历的史实来说,1976年之前从来没有“兵諫亭”之说,遑论“重新”命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景点简介1982年就换了,并配了英文译文。对现在碑亭“兵諫亭”题签出自何人手笔,本人未考证。1986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共中央肯定了事变的“兵諫”性质,而“兵諫亭”的名称,临潼从1976年11月留存至今已48年,国内外学界与民间,均对此无异议。

现在回忆起来,也算我亲历的一桩軼事吧。(作者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2月任中共临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本文转自“临潼政协”公众号)

《梁秋燕》与梁梅叶的半世情缘

□ 孟宪春

“阳春几天秋燕去田间,慰劳军属把菜锄……”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眉户现代戏《梁秋燕》蜚声三秦、走向全国,演出数千场而经久不衰,一度形成了“梁秋燕”表演艺术派系。据不完全统计,仅“文革”前,该剧就上演了数千场之多。全国各地观众中流传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看了‘梁秋燕’,打倒老封建;看了‘梁秋燕’,媒人靠边站;看了‘梁秋燕’,恋爱有经验”的美誉,梁秋燕也成为新时代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典型。在相当长时间内,“梁秋燕”成了一代人冲破封建牢笼、寻找自由爱情的偶像。

《梁秋燕》原名《婚姻要自主》,剧本描写了全国解放初期新婚姻法颁布后,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塬农村姑娘梁秋燕与同村青年刘春生相爱,遭到父亲梁老大的反对。梁老大托媒人侯下山把梁秋燕许给董家湾16岁的董学民,并向董家索要了彩礼,以便为儿子梁小成订亲。梁秋燕坚决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在刘二嫂的帮助下,争取得到母亲、哥哥和区长的支持,与刘春生结成佳偶。梁小成与青年寡妇张菊莲相爱,也自主结婚。梁老大在事实教育下,明白了买卖婚姻的害处,转忧为喜。该剧以婚姻自主为主题,对农村残留的封建买卖婚姻作了批判,表达了青年一代对幸福家庭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剧中的梁秋燕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不怕流言蜚语,敢于同旧思想、旧作风作斗争,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青年妇女新的精神面貌。

《梁秋燕》的创作源自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梁秋燕的原型是高塘区北村梁崖的梁梅叶。1952年春,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和文化部联合成立了一个“新婚婚姻法检查组”,目的是宣传检查新婚姻法颁布后在农村的实施情况。检查组到高塘以后,就驻在高塘区公所。当时刚处于解放初期,高塘墟区还遗留了许多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妇女在家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在家里经常受到虐待。听到检查组来到高塘墟区的消息后,许多青年妇女纷纷到区政府诉说她们的悲惨遭遇,请求区政府为她们作主,解除包办买卖婚姻,提高社会经济地位。

家住北村梁崖的梁梅叶深受包办买卖婚姻之苦,其父梁金胜要把她嫁给董家,梁梅叶坚决不从,遭受父亲毒打以致胳膊受到重伤。梁梅叶跑到区里哭诉,区长东生祥见此情景,马上带上梅叶到董家,严肃批评了梁金胜,并向其宣传新婚婚姻法。梁金胜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不再干涉女儿的婚事。检查组的同志对梁梅叶十分同情。“新婚婚姻法执法检查组”的黄俊耀同志突然萌生了用戏剧宣传新婚婚姻法的想法,于是他就着手创作剧本,剧本以梁梅叶第二次抗婚为主线,她不愿与董某结婚,与农村青年春生自由恋爱,被父亲打骂,最后在区长的调解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为主要情节。

大约4月中旬,检查组从潼关回来,黄俊耀把初稿写好了。此后,黄俊耀又多次修改剧本,增添和删减人物,校正主题。“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梁秋燕》由渭南专区文工团排演,正式演出后反响强烈,唱红了渭南专区。到了8月中旬,黄俊耀同志把该剧的演出效果向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院长马健翎作了汇报后,马健翎决定渭南专区文工团《梁秋燕》剧组演职人员20余人去西安戏曲剧院演出。当晚在演出现场观摩的有



陕西戏曲研究院2018版眉户《梁秋燕》(剧照)

封至模、苏育民、李正敏以及西安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名流。其后的第四稿演出的《梁秋燕》是由西北戏曲研究院排演,梁秋燕由李瑞芳同志扮演,这是西北戏曲研究院成立后面向社会推出的第一部眉户现代戏。

当时,取材于华县高塘墟区真实生活素材的《梁秋燕》排演了。刚从天水的部队文工团转业到西北戏曲实验学校做演员的李瑞芳第一次演梁秋燕。在黄俊耀等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李瑞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9个月后才终于使《梁秋燕》在首演中一炮打响。

1958年《梁秋燕》晋京演出受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戏剧大师梅兰芳、曹禺看了演出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剧巡回江南13省(市)演出,饮誉京华、蜚声全国,久唱不衰。1980年,陕西省电视台将《梁秋燕》拍成电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梁秋燕”成了一代人冲破封建牢笼,寻找自由爱情的偶像。而李瑞芳则成了“梁秋燕”的化身。

1999年,一篇新闻报道将当年因首演《梁秋燕》而一举成名的李瑞芳和《梁秋燕》的原型——华县高塘镇朱张村的梁梅叶联系到一起,50多年后两位“梁秋燕”相逢成就了一段人间大爱的美好传奇。1999年,华县东阳中学语文老师贾宝勤、原高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书经根据一些知情人和当事人的叙述,在高塘镇朱张行政村找到了“梁秋燕”的人物原型——年已六十多岁的梁梅叶老人。经过他们采访得知,梁梅叶一生有三次婚姻经历,第一次嫁给了高塘南堡的庞某,因为感情不和,不久就分开了;第二次是经地干爸侯某介绍,将其嫁给吉河村东窑子的董家,由于她坚决反对去董家,被父亲梁金胜多次毒打,以致胳膊被打成重伤;第三次经人介绍,自由恋爱嫁给了朱张村的理发匠东家奎,一家人就靠东家奎理发挣钱度日。在当年高塘区区长东生祥等人的带领下,贾宝勤、张书经来到梁梅叶家。当时,梁梅叶家三间厦房和一眼土窑。她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已出嫁;三个儿子都是弱智人,只会出力死做,至今都没有成家。她和老伴年纪大

了,体弱多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作为《渭南日报》通讯员的贾宝勤、张书经,写了一篇《寻访今日“梁秋燕”》的新闻消息稿,系统介绍了梁梅叶的三次婚姻经历和她家的困境,并向西安各大报纸投稿,当年9月先后被《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各界导报》等10多家报纸采用,引起华县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慈善协会等部门的高度重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速约梁秋燕的扮演者、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瑞芳和梁老大的扮演者吴德多次到梁梅叶家探望,并送上慰问金500元。时任华县县委书记薛东江同志带领县民政局、县妇联、高塘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多方进行协商,为她家建新房,经过各方筹集资金,建起了三间砖混结构的新平房,改善了她的居住条件。陕西电视台多次对梁梅叶进行采访报道,西安几家大医院把梁梅叶接到西安,免费为其治病,还给她买了新衣服,两位“梁秋燕”相逢在三秦大地引起了轰动。2007年3月28日,在华县高塘镇,由华县妇联和高塘镇政府联合举办的一场特别的捐款仪式在梁梅叶家举行,演“梁秋燕”的李瑞芳和“梁秋燕”的原型梁梅叶第二次见面。在梁梅叶家举行的捐款仪式上,李瑞芳一步上去,嘴里叫着“秋燕”,紧紧握住了梁梅叶的手,两位因眉户现代戏《梁秋燕》而结缘的70多岁的老人又一次紧紧拥抱,这次共收到捐款6630元。

眉户现代戏《梁秋燕》唱红了陕西乃至西北大地,当时在三秦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该剧一方面反映了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新婚婚姻观变革,富有时代变迁气息。另一方面凸显了革命老区华州高塘墟区独特的风土民情,贴近生活很接地气,戏曲语言朴实幽默,很有地方情调和色彩,矛盾冲突跌宕起伏,耐人寻味。梁秋燕是陕西乃至全国一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戏剧人物,是一个走入人们灵魂中的真实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国当代戏曲的一个重要品牌。

文史小百科

今人有网购热潮,“双11”活动更是让无数人沉浸在疯狂购物的狂欢之中。那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满足自己的购物欲望呢?古人是否也有类似的“购物节”呢?

在古代,集市是人们进行买卖活动的重要场所。在特定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至,一个固定的地点瞬间变得热闹非凡,商品交换在此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每逢重要节日,更是商贩们集中开市的好时机。

若想一窥古人“购物节”的盛况,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无疑是绝佳的窗口。在这幅传世名画中,北宋汴京的繁华景象如在眼前。清明时节,春风拂面,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贩卖茶叶的摊主热情地吆喝着,看相算命的先生故作神秘地招揽着客人,摆摊卖杂货的铺子前挤满了挑选货物的百姓。众多购物者身份各异,有的坐轿,轿夫们小心翼翼地抬着,生怕惊扰了轿中贵人的雅兴;有的骑马,骏马飞驰,尽显英姿飒爽;有的挑担,脚步匆匆,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穿梭于市场之中,或与摊主讨价还价,或对新奇的玩意儿啧啧称奇,市场交易的热闹景象和生动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听到那嘈杂的人声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清朝丁观鹏的《太平春市图》则为我们展现了新春市集的别样热闹。新春之际,乡人彼此鞠躬作揖,互道新年的吉祥话语,脸上洋溢着幸福与喜悦。摊贩们叫卖着爆竹,那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在预告着新的一年将热闹非凡;太平鼓咚咚作响,敲出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果品色泽鲜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玩具琳琅满目,吸引着孩子们的目。还有那耍猴的货郎,猴子机灵地表演着各种动作,引得围观者阵阵喝彩;跑旱船的艺人们步伐矫健,船儿在他们的手中摇曳生姿;演傀儡戏的舞台前围满了观众,大家为精彩的表演拍手叫好。这多姿多彩的市集活动,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年节景象,更展现出那个时代独特的特色与风情。

古代的“购物节”,虽没有今日网络购物的便捷与高效,但那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集市,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那在热闹氛围中传递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却别有一番韵味。在岁月的长河中,这些曾经的繁华与热闹,成为了历史的珍贵记忆,让我们得以领略古人生活的丰富多彩。

古代赈灾之策

□ 余娟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粮食产量并不充裕。每当遇到天灾,粮食更是变得极为紧缺,百姓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府在赈灾时选择了施粥,而非直接发放干粮。这一决策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考量。

首要,施粥能够高效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官府手中的粮食有限,需要精打细算地分配给受灾百姓。而煮粥正是一种高效的粮食利用方式。通过少许的米加上大量的水,就能烹煮出大量的粥,让更多的百姓得以填饱肚子。相较于发放干粮,施粥能够确保更多的人得到及时的救助。

其次,施粥能让百姓产生饱足感,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安慰。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一碗热腾腾的粥如同一剂强心针,能够迅速缓解饥饿感,给予百姓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慰藉。这种饱足感不仅有助于稳定民心,减少社会动荡,还能让百姓在艰难的时刻感受到来自官府的关怀和温暖。这种关怀和温暖,对于受灾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

再者,施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地实现公平和公正。在古代社会,受灾的百姓众多,而官府手中的粮食有限。如果直接发放干粮,很难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粮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不满和纷争。而施粥则能够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碗热粥。这种方式虽然简单,但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地实现了公平和公正,减少了因分配不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此外,施粥还能避免消化问题和悲剧的发生。长时间未进食的饥民,其消化系统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如果突然摄入大量的干粮或馒头等硬质食物,不仅不利于消化,还可能因为狼吞虎咽而引发噎死的悲剧。因此,官府选择施粥,既能能够缓解饥民的饥饿感,又能够避免因食物过硬而引发的消化问题和悲剧。这体现了官府对百姓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除了上述现实原因外,施粥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在古代封建王朝,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需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而赈灾工作正是帝王展示自己关怀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机会。通过施粥等赈灾措施,帝王能够赢得百姓的感激和信任,从而增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种政治考量虽然看似功利,但实则也是帝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百姓福祉而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